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35

2008年4月11日

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共產黨人楷模 —— 憶敬愛的王震老

中國社會科學院 李慎明

2008年4月11日，是我敬愛的、我在其身邊工作十多年的王震同志誕辰一百週年。

1993年3月12日，我國南方英雄花綻放的季節，王老在廣州走了。

王老，您走了15年了。您走了，但您的音容笑貌，卻時時在我們這些工作人員的眼前和心裡。

我第一次見王震老是1980年9月27日，在新疆。那時，他率中央代表團慰問新疆各族軍民，我作為《解放軍報》報社記者隨團採訪。1982年底，我又被調到王老身邊工作，一直到他去世。王老的前半生，無疑為黨、國家和民族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我常

想，在王老生命的西天上，開著比朝霞還要絢麗的晚霞。這也可能是因為我直接在晚年的王老身邊多年工作的“偏見”吧。

王老的一生波瀾壯闊。在王老一百週年誕辰之際，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有著千言萬語奔湧心頭。王老去世後的1993年3月19日，新華社在播發王老的生平時說他“艱苦樸素，廉潔奉公”，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深深知道，這決不是空洞的文字，也沒有絲毫的過譽。

來到王老身邊工作後，在整理文檔時，我看到，王老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先後頒發的《關於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文件的空白處和反映一些高級幹部艱苦奮鬥，不搞特殊化的事跡材料上批示：“親屬成年人傳閱，然後工作人員傳閱，再開一、二次會討論如何嚴格遵守規定。”“季青同志（王震同志夫人 — 作者註）閱告栗勇同志（王震同志駐地管理員 — 作者註）不許搞特殊化。”“宿舍各員都看看，要奉公守法。”“季青並栗勇同志，要切切實實遵守政令辦事。”

198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整黨決定，王老任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顧問。就在任顧問的當天，他在一張白紙上，恭恭正正寫下了北宋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伶官傳序》得出的“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自然之理”之結論。

跟隨王老十多年，親眼所見，又聽其老部下所談，對王老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之事，瞭解得便更多。王老牢記親耳傾聽過的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關於務必保持艱苦奮鬥作風的殷殷訓戒，王老無疑是我黨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楷模之一。這從他的衣、食、住、行、用和對待禮品的態度上表現得比較充分。

先說衣。戰爭年代，環境艱苦，王老那粗布做成的舊軍服上經常是補丁摻補丁，甚至一隻腳上穿著皮鞋，一隻腳上穿著草鞋。新疆和平解放後，他和廣大幹部戰士一樣節衣縮食，穿沒有口袋

的軍衣，戴沒有襯裡的軍帽，省下錢來用於軍墾生產。50年代，任鐵道兵司令員和農墾部長時，經常穿的是套舊軍裝。1957年，率中國農業代表團赴日本考察前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回來後，又換上了舊軍裝。由於長期跑基層，又加上在那個年代，這套西服很少穿，結果讓蟲打得厲害，花30多元修補好後送了人。王季青說：“給他添件衣服難著呢！他不許別人給做衣服，一說做，他就鬧騰！”後來，沒有換洗衣服了，就比照身材和他差不多的大兒子王兵剪裁做好，然後下水洗得舊一點，不讓他察覺，換著穿。70年代初，從江西回來重新工作後，王老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夫人王季青用王老和自己兩個人的布票，扯了18尺藍灰的卡，給王老做了一套中山裝。的卡結實、耐穿、隨意。王老不僅經常在家裡穿，在平日活動時也經常穿，直穿到去世前，先後20多年，舊的發白。改革開放後，王老添了套黑呢子中山裝，用來出國和外事活動時穿。1984年，社會上興起穿西裝熱，家裡人和工作人員趁他率團到日本訪問前，勸他又做了一套西服。1985年，他率團訪問美國，大家勸他再添一套西服，以便換洗。王老說：“不用添，我那套中山裝可以替換”。大家說，到發達的美國去訪問，不能太寒酸了。王老說：“什麼寒酸，節儉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他堅持不允。大家攛掇他最喜歡的兩個孫女京京、京川做爺爺的工作，王老把兩個孫女都罵哭了，最後只好讓服裝店比照他原有的那套西服才給他又做了一套。王老穿得毛衣都是王季青和保姆馬小妹用普通毛線手工編織的。他的內衣穿破了，總是讓補補再穿，經常是一件內衣有六、七個補丁。20世紀70年代前，他沒有穿過皮鞋，總是穿布鞋。解放後直到去世的44年間，除了軍裝，滿打滿算，王老僅添置過七、八套衣服。

再說食。50年代時，王老規定炊事員給自己家每頓做四、五個菜一個湯，伙食費每個月全家每人不得超過30元。60年代初困

難的時候，他規定變成了三菜一湯。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人伙食費逐漸增加到80元。他還規定，要多吃粗食，每頓的剩飯下頓要熱熱再吃。給王老當了幾十年管理員的栗勇師傅開始沒有認真執行。王老愛吃米，60年代時糧店供應的米少，栗勇便從機關食堂“調劑”點米，王老發覺後，很認真地批評了這件事。伙食費超了，王老也批評。此後，栗勇執行指示，說一不二，包括經常熱剩飯。吃飯時，若是飯粒掉到桌上，王老便用筷子夾起再吃掉，若是掉到了地上，他常常是嘆口氣說：“又要浪費了。”栗勇說，“給王老管伙食，很簡單，他胃不好，早餐常吃烤饅頭片，午餐晚餐經常吃雞蛋麵條。”有時晚上外出回來晚，為了不再打擾老師傅，他便讓警衛參謀何茂祥給自己做碗“掛麵臥雞蛋”。開始何茂祥怕做不好，王老鼓勵他說：“誰開始也都不會做”。後來何茂祥的滄蔥掛麵做得噴香。王老冬季不吃時令鮮菜。他說“那都是大棚生產的，有的比肉還貴。”不僅自己不吃，他還不讓家裡人吃。冬季飯桌上，往往是白菜、蘿蔔、土豆這些大路菜。為了調劑生活，他讓炊事員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腌製雪里蕻、芥菜、胡蘿蔔等小菜。六、七十年代酸白菜腌製一大缸，80年代家裡工作人員多了，又增加了一大缸。60年代初，王老在北京時，經常不帶其他隨員利用星期日到郊區農場“微服私訪”。錯過午飯時間，他便讓老司機于九天到食堂買來三個涼饅頭，老于吃兩個，他吃一個。1971年10月間，王老從江西下放回到北京。家裡的爐灶還沒修好，組織上安排他吃住在北京飯店，他說不浪那個費，就讓管理員在院子裡用磚頭支個鍋，每天和家裡人一樣，麵條就著煮白菜、炸辣椒吃。就這樣吃了一星期。外出時，王老總讓工作人員通知接待單位：“飯菜上不要特殊，我愛吃豆腐，有豆腐就行。”80年代後，興起了罐裝飲料。一見上這種飲料，王老便給算賬：“一罐兩塊多錢，裡邊的飲料不值一塊錢，光包裝就一塊多，浪費太大。陳雲同志說，可口

不可樂。以後飯桌上、房間裡不能上這種飲料。”工作人員都自覺遵守。1985年11月15日，王老在廣東珠海說：“一看到有人開那個筒筒，我就心疼。”

再說住。50年代初，王老從新疆調北京工作，住什剎海附近的冰窖胡同五號。同住的還有張愛萍、甘泗淇、朱早觀等幾家。王老一家加上兩名工作人員，住七間房子，緊緊巴巴。三個兒子擠在僅有五、六個平方米的一間小屋裡。夏天太悶熱，兒子們便搬到前院張國華正房後邊的半露天的走廊裡住。經常是半夜裡風雨突起，蚊帳被單被打濕。當時，王老任鐵道兵司令員，鐵道兵多次動員他搬家，他不答應，一住就是三年。後因駐地沒有車庫很不方便，經再三動員，王老答應搬到成方街五號，但交待說：“不修繕，不裝修，是什麼樣，就什麼樣住進去。”一直住到1969年沒有裝修過。王老安排，自己辦公室、會客室、臥室加上夫人王季青用房，共四間，三個孩子佔一間，節省出住房讓秘書、管理員、炊事員都住了進來。王老說：“這樣工作方便，也為國家節省住房。”住房中裝有暖氣，但冬季王老不讓燒，他說：“那太浪費，屋裡生爐子挺好，既可以取暖，又可燒開水。”1971年，全家從江西回來後，先住在北太平莊，後住在東四11條，都是舊房子，也不寬裕。1975年搬到六部口翠花灣九號。這個院本是前後兩個院，前院14間房，後院比前院多了三、五間。王老說：“前院的房我不用，中間砌道牆隔開。前院還可住一家，後院的夠我用了。”王老又給分配住房：三個兒子，每家一小間，孫子輩長大了，一個孫女跟奶奶睡，一個孫子跟王老睡。王老說：“小孩子火力壯，給我暖被窩，正好！”夏天，有的工作人員沒有床鋪午休，便睡沙發。1976年地震後，王老住的住房的牆震裂了，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作為危房要改造。王老不以為然。管房的同志給他做工作，做不通，請來了當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吳慶彤。吳慶彤說：“您這房老了，高，又沒

有支柱，再大一點地震，一搖就垮。您老說沒事，就是有點小事我們也負不起這責任。”好不容易做通了工作，但王老又提出了新條件：“牆不行了，換，但門窗還都是半新大半新，不要換。”改造後的房子除換掉個別朽壞了的窗子外，其餘門窗全部用的是舊的。翠化灣九號，在大雜院深處，進出一次，要繞拐近十次。工作人員經常借用歌曲《瀏陽河》的曲子唱：“翠花灣，彎過了幾道灣？”，“翠花灣，彎過了九道灣！”王老當了國家副主席後，外賓經常到家裡拜訪。不少同志提出說，王老的住房太簡陋，進出又十分不便，最好換處住房。王老說：“這條件已經很不錯了。比起延安的窯洞強多了吧！比南泥灣和北大荒開荒時的條件也好多了，就和普通老百姓相比，也不知強出多少倍。我們這些人的開支已經不得了啦，又是司機、醫生、警衛、秘書，給國家的負擔已經夠大的了，住房再也不能換了！”

再說行。1952年到北京工作後，直到去世前，王老坐過五臺車。第一臺是吉姆，從1954年一直坐到1970年。中間大小修過四次。司機老于說：“王老常年跑基層，汽車留北京，不費。”60年代初，王老到中南海開會，半路車壞了，他便攔叫一輛三輪車。中南海的門衛不讓三輪進。王震說：“毛主席召集的會，已經遲到了。”待王老解釋清楚了，門衛戰士才讓這位共和國的部長搭乘的三輪車蹬進了中南海。第一臺吉姆實在不能跑了，又換一臺舊吉姆。當了國務院副總理後，給他配了臺吉斯，後來換成了紅旗。改革開放後，變成了尼桑。王老幾次對司機老于說：“我們不能總想著換車，能跑就行。我死了，你就用這個車把我送到八寶山。”再後來，坐上了外賓贈送給鄧小平，鄧小平又轉送給他的奔馳。1989年政治風波後，黨中央提倡黨政幹部要帶頭坐國產車。王老幾次指示工作人員把奔馳車上交。工作人員解釋說：“您這臺車不是配發的，是小平同志轉送的。您現在可以稱為元

老了，您不坐，誰還敢坐，上交後放到那裡也是浪費。再說，我們交，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不收。”王老說：“別找那麼多理由，交！”後來，工作人員把“奔馳”鎖到車庫裡一段時間。王老去世後，王季青即決定，把這輛奔馳上交了。到外地視察，王老不坐臥車，總與陪同人員和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坐十多座的中型麵包。這樣一可以省汽油，二來在車上隨時可以和陪同人員交談，瞭解情況。一次在湖南邵陽，他開始不知道前面有警車，後發現警車不但“噢噢”直叫，還粗暴地趕開群眾。他非常生氣，讓車馬上停下，但一時又無法制止警車，他便讓司機甩開警車，掉轉車頭選另外的路線走。因工作必須有警車開道時，他也常交待不要動不動就鳴笛，“不要搞得地動山搖”。下雨天，他還常交待司機，到行人身邊要開慢點，免得把積水濺人身上。一次回家路上碰到了大卡車卸貨擋路，司機想下車請卡車讓道。王老連忙制止說，不要著急，等他們卸完貨我們再走不遲。王老還常向家裡人交待說：我的車是公家的，只許我上班、開會用，你們不能隨使用。王老是個孝子，但 60 年代末，他老母親病了，他讓工作人員陪老人家乘公共汽車去住院。孩子們都是騎自行車上下班，不搭他的便車。如果是必須用的私車，王老總讓于師傅登記清楚。60 年代時，每月都要交十多元用車費。他的夫人王季青到晚年腿腳不便，還經常乘公共汽車或走路上街買東西或看老同事。

再說用。王老主張公私要分明。他的孫子小時候要拿他的辦公用紙做演算紙用，他說：“這不行喲，要五講四美。”他反對用公家傢具，除了會客室的沙發及他用的書櫥、辦公桌椅是公家配發的外，其餘他都要自家購置。無論是公家配發或是自家買，均要求方便實用即可，反對配或買高檔的。一次，家裡的木板椅換成了皮面椅，他好一頓發火。一個大衣櫥從 50 年代一直用到去世，大衣櫥的門關不上，就用舊報紙墊掖著。客廳裡的沙發用了近 20 年，搖

搖欲墜還不換。王老睡的始終是一張極普通的硬木板床，80 年代初床上加了層塑料泡膜墊。王老的床頭擺放的是任弼時兒子任遠遠手工製作送他的簡陋的檯燈，上面用紅油漆寫著：“為革命的老英雄王震副總理設制 任遠遠 一九七七·二”。這個檯燈一直用到去世。說來很多人可能不大信，王老洗澡沒用過浴液，就是肥皂、香皂也很少用。他說，我又沒勞動，身上不太髒。一用香皂水就髒了，別人再洗澡和洗衣服就不能用了。他用熱水沖泡過後，讓孫子、孫女接著洗。他們洗好後，也不讓放掉，讓保姆用來洗衣服。白天，他在院裡散步，發現廁所燈亮著，馬上找人關掉，並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員要節約用電。晚年，他患有慢性支氣管炎，痰多。外出時，警衛參謀口袋裡裝著手紙巾，備他用。他批評說這是浪費，讓用一個廢罐頭盒盛點沙子放車上，回家後換上新沙子下次再用。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儘管他身體十分虛弱，無力抬頭吐痰，為節約一張紙巾，仍堅持要十分吃力地側過身把痰吐到痰缸裡，不讓醫護人員用紙巾接。談及此事，醫護人員和身邊其他工作人員都激動地流著淚說：“王老是我們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光輝榜樣！”王老去世後，許多人趕到翠花灣九號弔唁，見到這位國家副主席、這位共和國的開國元勳的客廳、辦公用品和生活用具等是如此的簡樸後，都感到很驚訝，更多的是感動。

王老的夫人王季青說：“我們結婚後直到實行薪金制前，他沒有給過我一塊錢，也沒有給我買過一件東西。實行薪金制後，他定的五級每月 370 多塊，三年自然災害時，他的工資減到了 340 元。他口袋裡從來不裝錢，也從來不花錢，不問他的工資哪去了。我定工資是 12 級，每月 170 元。孩子們參加工作後，他說家裡花錢的人少了，通知管理員不要給我領工資，把工資全部交黨費。這樣我一年多沒有領工資。後來大孫女由我們來帶，照顧不過來，又要請人，他一個人的工資的確不夠花了，我才又開始領我的工

資。”王老先後把節約的幾千元錢捐贈給湖南瀏陽家鄉的建設。在晚年，又先後把節約的上萬元捐贈給了他擔任理事長的中國中小學幼兒教師獎勵基金會。他節儉自己，為的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革命事業。

最後說說禮品的事。王老的老部下多，戰鬥、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多，大家對他有很深的感情，有時有的帶盒茶葉什麼的，王老也不好意思拒絕。但數額稍大時，王老都堅決退回或作價付款。1961年春節前，黑龍江墾區用兩個麻袋反套一口砍掉腦袋的肥豬，讓火車託運來。王老發現了，立即通知農墾部食堂一個姓宋的管理員拉走，讓機關的同志過個好年。王老的炊事員陳師傅回憶說：“那時王老家五口人，每天憑本只能買五毛錢肉，正是過苦日子的時候。我要砍下兩斤，王老堅決不讓，眼睜睜讓拉走了。”1962年秋，王老的家鄉瀏陽蜜桔大豐收，給他帶來三筐共150斤。當時瀏陽的蜜桔每斤兩毛錢，王老則按北京的市價每斤四毛付給了家鄉來人。他還親自寫信給中共瀏陽縣委，要求他們要堅決執行中央有關不許送禮的規定。大別山老區湖北羅田縣是王老直到晚年都密切聯繫的點。時任羅田縣副縣長王宗武經常帶點板栗、綠茶等土特產來看他，他每次都要自己的管理員算清付錢。開始，王宗武過意不去，並開玩笑說：“這是王老見外。”王老作正色答：“大別山許多事情還沒有完全辦好，人民生活更困難，將來我們到馬克思那裡報到，本來還交不了差，心裡很有愧，怎麼還能白吃老區人民的東西，剝削老區人民呢！”聽了這番話，王宗武說：“作為開國元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王老，如此廉潔奉公，嚴於律己，使我深受感動和教育。”當了國家副主席後，外事活動多了，對外賓贈送的禮品，他都按規定上交。有時外賓贈送的技術先進的小型自動照相機，他或交給機械部有關研究所研究，或轉贈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或黑龍江農墾總局使用。1990

年9~10月第11屆亞運會期間，全國農墾產品展銷會在北京舉行，時值王老在解放軍總醫院住院。各墾區聯名給新中國農墾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王老寫來慰問信，並送來幾箱包括熱帶稀珍的各種水果。王老在慰問信上批道：“亞運會動員了全國人民的革命精神，贈我的禮品轉贈亞運會”。遵囑，工作人員很快將水果送到了國家體委值班室。1991年9月間的一天，王老從人民大會堂會見外賓後回到住所，發現院裡的一個竹筐裡擺放著幾條大白魚。他知道，這種名貴魚，只有黑龍江中蘇邊界的興凱湖中有。他馬上找來管理員栗勇問：“是不是東北農墾的同志送來的？”得到肯定的答復後，他又馬上交待：“送到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讓他們招待外賓！”栗師傅知道他十分愛吃這種魚，便悄悄留下一條，但當王老發現後，栗師傅又挨了一頓批評。

這就是我作為王老身邊的工作人員所瞭解的王老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事跡的一鱗半爪。這些事跡，誕生在那些特定的年月，但這些事跡，折射著我們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熠熠生輝的高尚情操，這也是那個特定的年代共產黨人保持本色、密切聯繫群眾特有的方式。王老身上體現的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優秀品質，完全是其內心世界的流淌，沒有絲毫的做作。現在，我們國家富裕了，但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反復強調全黨同志要牢記“兩個務必”精神。王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緬懷和學習。

2007年12月24日，我們工作人員同樣十分敬重的王老的夫人王季青同志也走了。她與王老相知、相伴，一道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王季青同志曾當過北京市女八中校長，我們工作人員都叫她“王校長”。我們深知，王老與王校長兩位老人都是十分真誠純粹、當之無愧的共產黨人。王老、王校長，您們若地下有知，不，共產黨人會有另一個天堂，您們倆會在那個天堂裡永不分離。